

《墨子间诂》校勘述略

王世伟

孙诒让是清末著名的校勘学家，一生整理古籍不下百种，所撰《墨子间诂》被梁启超誉为孙诒让一生著述之冠^①，被俞樾赞为“自有《墨子》以来未有之书”^②。对于这样一部在古籍整理中成就卓著的巨作的校勘实践加以研究，无疑是很有价值的。

一、《墨子间诂》的撰写与刊刻

《墨子间诂》始撰于一八七七年，至一八九三年冬十月写定，历时十六年之久。一八九四年夏，“属吴门梓人毛翼庭以聚珍版印成三百部”^③，世称初印聚珍版，为《墨子间诂》最早的版本。关于此书有两点需要说明：

（一）此书为孙诒让亲自校对，错误之字，皆用铅粉抹去重印。如《墨语》下第十二页正面第二行“朝”，原作“廟”，用铅粉抹去重印“朝”，然“廟”字仍依稀可见。取此书与以后刊布的永嘉王景羲整理的《定本墨子间诂》互校，则后者字句讹误不少。如《尚贤下》第十“晞夫圣武知人”，孙注云：“晞夫，叹词。”注文“晞夫”，《定本墨子间诂》误为“晞大”，聚珍本不误。又《尚同中》第十二“以求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”，《定本墨子间诂》“兴”下脱“天下之利除”五字，聚珍本不脱。可见，聚珍本最为可信，甚为珍贵。

(二) 聚珍本刊布之后，孙诒让及其交游和同邑学者均有所刊正，然孙氏未及校定而见背。一九一〇年，王景羲“拾征君（孙诒让）之余论以补之遗”，“旁参己见”，成《定本墨子间诂》，则《定本墨子间诂》有聚珍本所未备者。《定本墨子间诂》行，而聚珍本遂不为世所重，如一九二七年校经山房成记书局之石印本，一九三六年商务印书馆《国学基本丛书》本，收入《诸子集成》的世界书局本等均依据王景羲整理本。但聚珍本与《定本墨子间诂》各有所长，此治《墨子间诂》者不可不知。

二、《墨子间诂》校勘所用版本考

孙诒让《墨子间诂序》云：“余昔事饴览，旁摭众家，择善而从，于毕本外，又获见明吴宽写本、顾千里校道藏本，用相勘复，别为写定”。兹分别考之。

(一) 明吴宽写本（以下简称吴抄本）

孙诒让《墨子间诂序》云：其所据吴抄本，为“黄丕烈所影抄者，今藏杭州丁氏，缺前五卷，大致与道藏本同。”《士礼居藏书题跋》卷四有《墨子》十五卷（影写本），即指此。当时吴抄本藏归安严元照芳椒堂，顾千里曾借之，而黄氏复向顾氏借阅影写。黄丕烈云：“初余以此本为吴文定手抄，凭张青父（张丑）跋信之，千里尚犹豫未决。既检陆其清（陆澐）《佳趣堂书目》有云，《墨子》十五卷，吴匏庵手录，张青父旧藏。此更信而有证矣。”黄丕烈曾用吴抄本校嘉靖壬子陆校芝城蓝印铜活字本（以下简称铜活字本），认为两本大致相同，而吴抄本年代较铜活字本为早^④。吴抄本自孙诒让校后，仅吴毓江《墨子校注》提及^⑤。吴毓江云：“明吴匏庵手抄《墨子》为《墨子》有名旧抄，无增省窜改之迹，其为可据早有定评，孙诒让据以校正毕本《墨子》处甚多，今重加校勘，知其中尚有可采者，如《非乐》

篇‘其说将必与人’句，他本‘与’下皆涉下文衍一‘贱’字，此本独不衍，是亦其底本近古之一证也。孙氏与余所见皆自第六卷起，以上各卷访求未得，甚望藏是书者校其异同，供世人之研讨也”。则吴氏当时曾见吴抄本可知，今检现存古籍书目，多未见著录，是否存世，不得而知。

（二）明茅坤刻本

孙诒让《墨子间诂序》云：“明槧诸本大氏皆祖藏本，毕注略具，今并不复详校。又尝得倭宝历间仿刻明茅坤本，并为六卷，而篇数尚完具，册端附校异文，间数有可采，惜所见本残缺，仅存后卷。”这样就提出了两个问题，第一，日本仿刻本同原槧是否相同？第二，明槧众本源流如何？

先回答第一个问题。茅坤所校《墨子》并为六卷，而篇数次序与十五卷同，为九行二十字。此书为翻刻明嘉靖唐尧臣本（以下简称唐本），唐本有陆隐序，此本误署茅坤名，而茅序反署陆弘祚，弘祚即陆隐之字，书贾欲作伪而无识，遂有此误^⑥。据茅坤序，此书原刻于明万历九年。用茅坤原刻本校以日本重刻本，则间有异文。如《杂守》第七十一“以为羊岭”，孙校云：“茅本作岭，从今。”今检原刻本则作“岭”。《号令》第七十“为期其在尊害吏与杂警”，孙校云：“茅本期其二字互易。”今检原刻本则作“期其”。《迎敌祠》第六十八：“舍于中太庙之右”，孙校云：“茅本太作大。”今检原刻本，则作“太”。由此可见，日本宝历间重刻本已非茅本之旧，孙诒让据误本而校不能无失。近人杨葆彝取茅坤原刻本校以《墨子间诂》，举正发蒙，咸复茅本旧观，此后来居上。

再来回答第二个问题。《墨子》同《晏子春秋》一样，均无宋元本，而以明本见善。现存《墨子》明本有十几种之多，但要弄清众本源流，关键是要搞清铜活字本、唐本以及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陆隐刊本（以下简称陆本）三者之间的关系。此三者关系，

黄丕烈辨之甚明，其谓：“顷香严周丈有伊亲托售之书，内有蓝印《墨子》，遂丐归余。其来札云，此刻与华刻稍异，彼据道藏本，此出自内府。”又谓：“丁卯秋，续得嘉靖癸丑岁春二月吴兴陆隐序刻本，与此差后一年，而陆序中有‘前年居京师，幸于友人家觅内府本读之’语，知香严以为此出内府本者非无据也。陆序又云，‘别驾唐公以博学闻于世，视郡暇，访余于山堂，得墨原本，将归而梓之’，是又一本矣。今取唐本以勘陆本，殊有不合，知陆所云唐得墨原本者，非即陆本也。陆本出内府，唐本出道藏，殆不谬矣。惟陆本无序，唐本有陆之序，后人遂疑唐本出自陆本，其实陆刻先一年，唐刻后一年，实不侔耳”^⑦。于此可见，黄丕烈所称陆本，即铜活字本，其证有五：一，黄氏前言铜活字本出自内府，后言陆本出自内府。二，黄氏谓唐本有嘉靖癸丑陆隐序，而陆本无序，铜活字本亦无陆序。三，黄氏谓铜活字本与唐本差后一年，又谓陆刻先一年，唐刻后一年。四，铜活字本之所以称为陆本，是因为铜活字本目录后有“明刑部河南清吏司郎中吴兴北川陆隐校行”一行。五，尽管藏书家屡有提及所谓陆本，但谁也没有见到除唐本、铜活字本以外陆本的实物。叶德辉未达黄丕烈之旨，铜活字本又未曾经眼，批评黄氏误将两本析为三本，实在是以不误为误，其谬甚矣^⑧。其次，铜活字本与唐本殊有不合，即以行格而论，两本就有不同，铜活字本为半叶十一行，行二十二字。唐本为半叶九行，行十七字。至其内容差异则更多。黄丕烈颇赞同周锡瓚（香严）之说，即认为铜活字本出自内府，唐本出道藏。如此说成立，则孙诒让所云明槧诸本皆出道藏也不尽可据。其它明本，茅坤刻本即从唐本出。明嘉靖丁巳江藩刻本与唐本行款、字体、刀法无一不同，实为一本。唐本印行，即以原版送江藩，江藩加一序而再刻。明万历九年书林童思泉涵春楼刊本即茅本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。明天启郎兆玉堂策槛刻本、绵眇阁本均源出铜活字本。明万历丁丑潜庵序刻本、隆

庆丁卯沈刻百家类纂本、李贽批选本，或删节，或改纂，均无足取。则明代《墨子》众本源流，大略可见^⑨。

（三）毕沅《墨子注》（简称毕注）

此书始刊于乾隆四十八年。毕沅继卢文弨、孙星衍之后，“因遍览唐宋类书古今传注所引，正其讹谬，又以知闻疏通其惑，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，逾一岁而书成”^⑩。孙诒让《墨子间诂序》云：“毕本据明正统道藏本校定而不无舛讹”，可见毕沅是以明道藏本作底本。据毕沅《墨子》自序所云，可知毕氏以“两江总督采进本”和“明刻本”作校本。两江总督采进本收入《四库全书》，它以明堂策檻本为底本而加以校订，虽与毕注几乎同时，然校勘之功不及毕注远甚。毕氏所谓明刻本，即万历丁丑潜庵序刻本，一名子汇本，因其为《子汇》所刊诸子之一，故名。毕沅云：明刻本“其字少见，皆以意改，无经上下及备城门等篇，盖无足观”^⑪。就版本而言，毕注并非如孙诒让所说“明槧诸本大氏皆祖藏本，毕注略具”，因为明槧众本并非皆祖藏本，而毕注也没有略具众明本之善，因此孙诒让“今不复详校”的校例是不足取的。毕注虽未能尽善，但是在《墨子》古书尘埋多少年后，它作为第一个有影响的注本，流播极广，日本曾据以翻雕，浙江书曾据以重印，收入毕注的丛书也有十种之多，足见其影响之局大。

（四）顾千里校道藏本

孙诒让所据顾校道藏本，并非顾校原本，而是光绪丙戌春，德清蔡氏假陆氏十万卷楼所藏，传录以赠孙诒让者^⑫。《思适斋书跋》卷三有“《墨子》十五卷，经训堂本”条此书卷末识云：“乙卯二月七日校毕润裳记”。又一条云：“嘉庆己未再读一过，又正错简数条，润裳又记”。可见顾校底本为经训堂毕注本。

顾校道藏本，还有两点需要说明。第一是顾校季本，顾校李

本问题。顾千里以道藏本校毕本，并传录季本异文，而目卷五《非攻》以下或作李本。孙诒让题识云：“以上四卷，间出季本异文，不知何本，疑泰兴季氏旧藏抄本也。以后又作李本，必有一误。俟更访千翁所校底本复之。”今检《定本墨子间诂》则俱作季本，未知已复顾校旧观否。吴毓江《墨子校注》云：“其书作李本者五十二条，作季本者三条而已，且其季字又似李字，中划起笔钉头之状，其原文当为李字比较近情”，可备一说。第二是顾校本中“陈并”何谓问题。顾校本有跋，末题“陈并识”。孙诒让认为，“陈并”不知何许人，册内又有“陈大案”者，疑“免”字之误，盖硕甫先生手录也。孙说殊误。“陈并识”之“陈并”二字不当连读，盖陈德大既抄录之并识其后也。书中有“大案”而无“陈大案”，为孙氏误引。十万卷楼所藏之本现藏日本岩崎氏文库，卷首有“容斋社”、“海盐陈德大藏书”、“归安陆树声藏书之记”三印，卷末“陈并识”下有“德大之印”、“陈容斋”两印。显然，传录顾校者非江苏常州的陈硕甫，而是浙江海盐的陈德大。蔡氏传录陆氏藏本时未及印记，故孙诒让意为揣测之辞^⑬。

（五）《墨子间诂》校勘所用底本

孙诒让《墨子间诂序》谓：“……以为不谬者，辄就毕本更为增定，用遗来学。”可证孙校底本为毕注本。然毕本有乾隆四十八年经训堂丛书本、日本天保六年翻刻本、光绪二年浙江书局校刻本（以下简称浙本）等等。李笠认为，浙本为《墨子间诂》的底稿本，是说可信，其证有二。一是现在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有孙氏朱笔校本《墨子》，正是浙本，以孙氏朱笔文字与《墨子间诂》相核，内容大致相同。二是浙本较经训堂本，时有讹脱，孙氏校正不少，然有校之未尽者。如《贵义》第四十七“而助之修其身则愠”，唐本、茅坤刻本、经训堂毕注本均作“脩”，浙本作“修”，《墨子间诂》承浙本而未改。孙诒让用浙本作底本，

恐怕是浙本获之较易的缘故，这同清初学者校勘多用汲古阁本作底本的现象是相同的。

三、《墨子间诂》校勘成就评述

顾千里认为“古书无唐以前人注者易多脱误”^⑭，《墨子》即属此例。孙诒让继毕沅之后异军突起，扫千年尘埃，使《墨子》咸复旧观。其校勘成就，大致有下列五个方面。

（一）采摭旧校之成就

清初以降，研治《墨子》者辈出，孙诒让之前，有汪中、孙星衍、卢文弨、毕沅、王氏父子、洪颐煊、苏时学、俞越、戴望等，孙氏博采众家，择善而从。凡《墨子》讹脱之文而旧校精确者，径据补正以资省览。聚珍本刊布之后，孙诒让又以其质之通学。孙诒让学问交黄仲弢举正十多处，孙氏认为“多精瑁之论”，而孙氏自己亦续勘得是正处一百有余，于是随时逐录，别册存之。孙诒让又从金武祥处得张惠言《经说解》一书，读后感到“固有精论足补正余书之阙误者”。又从姻戚张之纲处借得杨葆彝《经说校注》，亦间有可取，“因与张解并删简补录入册，凡余旧说与两家有暗合者皆改从之，盖深喜一得之愚与前贤冥符遥契，固不敢攘善也。”^⑮如《经上》“平同高也”，取陈澧“两表齐高也”说。“紃，间虚也”，取王引之“紃乃栌之借字”说。“异，二、不体、不合、不类”，据毕注和吴抄本于“体”上补脱文“不”。《经下》“所存与者”，采张惠言“与下脱存字”校，等等。

（二）补苴旧校之未备

1. 补其阙。阙者，即旧校未校或漏校之处。如《经下》“字或徙”，“或”字旧无校，孙校云：“《说文》戈部云，或，邦也。或从土作域。此即邦域正字，亦此书古字之一也。”

2. 补其略。略者，即旧校未详未尽之处。如《经下》“服

执詵（音利）”，毕注：“‘音利’二字旧注未详。”孙校云，疑“音利”当为“言利”二字，本是正文，误作小注，……校者不憭，又改“言”为“音”。使旧校未详之处判然而明。又如《经上》“同长以击相尽也”，卢文弨云，𠂔，古文正，亦作缶。毕注云，缶即正字，并以唐大周石刻为证，然卢、毕二校均未说明缶字来源，意犹未尽。孙补校云，《集韵》四十五云，正，唐武后作缶，亦见唐岱宗观碑。

（三）匡纠旧校之讹误

《墨子》旧校多有卓见，然亦不无谬讹，孙诒让匡谬纠讹，其例有四。

1. 纠误断。如《经上》有“謂”字，毕注认为字书无此字。孙诒让引孙奭《孟子音义》为据，指出𠂔，作謂，謂、𠂔、𠂔并同声假借字。

2. 正误释。如《经上》“故所得而后成也”，此句中之“故”，意即因果之因。《说文》“故，使为之也”。孙校云：“此言故之为辞，凡事因得此而成彼之谓，《墨子》说与许义正同，毕疑或与因同，失之。张惠言云，故者非性所生得人乃成，尤误。”此句《经说》云：“（故）小故有之不必然，无之必不然，体也其有端，大故有之必无然，若见之成见之。”以《说》义证之，则孙校不刊。

3. 匡误读。如《经上》注文中有一字二训、一字三训、一字四训、一字六训乃至一字七训的例子，不明训诂便无以句断。如“已，成、亡。”张惠言云：“已有二义。”《广雅释诂》：“已，讫也。”已，既可训为事情的开始，又可训为事情的结束，故云“已，成、亡。”张惠言以此例正确地句读了类似的句子。但清人钮树玉未明此例，误读“见，体、尽”，为“见体，尽”，孙诒让遂据张读正钮断之非。

4. 订误训。如《经》上“久，弥异时也”，毕注云：“不

易其时，故曰久”。孙诒让取王引之说，以毕训为非。此句下文云，“宇，弥异所也”，则此句所云“久”即宇宙之“宙”。《淮南子·齐俗》篇：“古往今来谓之宙，四方上下谓之宇。”《周礼·春官·大祝》：“弥祀社稷祷祠”，郑注：“弥犹遍也”，《玉篇》：“弥，遍也”。宇指空间，久（宙）指时间，时间概括一切异时，故曰“久，弥异时也”。可见孙校至精。

（四） 考订经说上下篇旁行句读

先秦文献堪称“佶屈聱牙”，而《墨子》经说上下四篇人们更是“苦其奥衍，浏览率不能终卷”^{①6}。梁启超曾归纳为八事：“原本本皆旁行，今本易以直写，行列错乱，不易排比，一也。《说》与《经》离，不审所属，无以互发，二也。章条句读，交相错迢，上属下属，失之千里，三也。文太简短，其或讹夺，末由寻绎语言以相是，四也。案识之语，臚入正文，不易辨别，五也。累代展转写校，或强作解事，奋笔臆改，讹复传讹，六也。古注已亡，无所凭藉质证，七也。含义奥衍，且与儒家理解殊致，持旧观点以释之，必致误谬，八也。”^{①7}孙诒让认为，《非儒》以前诸篇，旧校略备，而经说、兵法诸篇“检览旧校，疑滞殊众，研核有年，用思略尽”^{①8}，可见其精力所至。“至于订经说上下篇旁行句读，正兵法诸篇之讹文错简，尤私心所窃自喜”^{①9}，可见其自得之情。今阅孙诒让经说四篇校注，释疑举正之处甚多，固皆精确。如《经上》：“忠，以为利而强低也”，校低为君，君氏篆书相似，一误为氏，复误为低。《经说上》：“（见）时者体也，二者尽也”，校时为特，形近而误，则形义并通。《经说上》：“为是为是之台彼也”，校“为是”二字不当复，盖转写误衍。《经说上》：“大故有之必不然”，据上句“小故有之不必然，无之必不然”句，校原句为“有之必然，无之必不然”，转写脱四字，则文义自协。《经上》：“读此书旁行，正无非”，校“读此书旁行”五字为后之校书者附记文，转写者误

入正文，又移著于“正无非”之上，则精校卓识。《经说上》“（生）盈之生，商不可必也”，读商为常，《广雅释诂》：“商，常也。”《经说上》：“志工，正也”，以“志工”读为“志功”，取《大取》篇“志功为辨”，“志功不可以相从也”互校，则信而有证。《经上》“似，有以相撓，有不相撓”，据《经说》牒字“𠂔”，校似为𠂔，则经说互协。《经说上》“民若画僂也”，校民为名，声近而误。《经说上》：“（圆）规写支也，”校支为交，形近而误，取《备城门》篇“支”误为“交”互证，则文义贯通。经说四篇，经孙诒让理董，始稍稍可读。

（五）订正兵法篇之讹文错简

《墨子》城守各篇，其难读程度，仅次于经说，而其错简的程度，在先秦两汉文献中也属罕见。作为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文献，其命运较之《孙子兵法》不可同日而语，这同历史上提倡玄学，独尊儒术不无关系，故此篇卷尘埋千年，无人问津。孙诒让整理《墨子》，于此数篇用力尤勤。

1. 析章句。城守各篇言守城之法甚有条理，而一篇之中，又有层次。孙诒让分析各篇章句，使段落分别，文义井然。《备城门》篇题下孙注云：“自此至杂守凡二十篇，皆禽滑厘所受守城之法也”，可谓提纲挈领，而于篇中段落处则随处注明。如：“以上惊门之法”，“以上凿幕门户之法”，“以上为高厝櫺候适之法”，“以上备穴之法”，“以上敛材瓦石之法”，“以上备队之法”，“以上柴搏之法”，“以上为闺门郭门蜚县梁板桥内外堞之法”，“以上木弩之本二字法”，“以上积石之法”等等，分析颇为细致。孙诒让在分析章句的基础上，校正了不少错简。如《迎敌祠》中有言记敌来祭神之法者，有言任用巫、医、卜之法者，有言战前祝史祭告及诸侯誓师之礼者，多有迷信色彩，然中间杂进一般守城之法，则于全篇文义相舛，故孙校云：此段文字“疑他篇之文，错著于此。”

2. 校讹文。如《杂守》篇校“孔表”为“外表”，校“找表”为“次表”，此为据形校正者。《备城门》校“冲术”为“冲队”，此为据音校正者。《备城门》校“城上千步一表”为“城上十步一表”，此为据义校正者。

3. 正错简。城守各篇简册错乱，俯拾皆是。有同篇错简者，如《备城门》自“城四面四隅”以下一百三十字，旧本错在“五十二步者十步而二”下，孙诒让依顾千里校移正。有异篇错简者，如《备城门》“小少易守”句下孙校云：“以上四十三字，本误错入《杂守》篇，今审定与此上下文义相承接，移著于此。”有脱简者，如《备突》篇仅叙述了城内作突门以备敌，未言敌人如何来攻，故孙校认为此篇有脱简。

四、《墨子间诂》在《墨子》校勘史上的地位

(一) 清代《墨子》校勘的总结

俞樾《墨子间诂序》云：“唐以来韩昌黎外无一人能知《墨子》者，传诵既少，注释亦稀，乐台旧本久绝流传，阙文错简无可校正，古言古字更不可晓，而墨学尘藴终古矣”，所谓“明珠委尘，幽兰弃莽，悠悠千载，莫或顾视也”^{②0}。《墨子》的校勘，滥觞于清代雍乾年间。最早校勘《墨子》的有张惠言、汪中、孙星衍、卢文弨、翁方纲和毕沅。张惠言有《墨子经说解》一书，为《墨经》有专注之始。“盖雍乾间墨学尚未昌，先生于举世废弃斥绝之时，为之正其句读，通其意旨，开孙、汪二家之先河，其用心亦良苦矣”^{②1}。据张惠言自跋，此书写于乾隆五十七年，为手稿本，藏书家偶有传抄而未见镂版，直到一九〇九年才由国学保存会印行于世。孙诒让在聚珍本印行之后，曾复校《墨子》，以未见张著为憾，后获此书写本，非常高兴，认为“余前补定《经下》篇句读颇自矜为创获，不意张先生已先我得之^{②2}”。其

书之价值，亦可见一斑。汪中曾校《墨子》并著《表微》一卷，惜今并亡佚，仅于《述学》中留存其两篇序。汪氏序云：“明陆稳所序刻，视它本为完，其书多误字，文义昧晦不可读，今以义为定，正阙所不知，又采古书之涉于《墨子》者，别为《表微》一卷。”又云：“又定其书为内外二篇，又以其徒之所附著为杂篇。”可见其校勘很有特点。在卢文弨、孙星衍、翁方纲等人对于《墨子》校勘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之后，毕沅继之而起。孙星衍于毕注后序云：“时则有卢学士抱经，大兴翁洗马覃溪及星衍三人者，不谋同时，共为其学，皆折衷于先生。”可见毕注是此时期《墨子》校勘的集大成之作，所以刊布之后，“颇行于世”^②。孙诒让校勘《墨子》，其采用校本正是以毕注为主，《墨子间诂》中采摭毕注甚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墨子》经说旁行问题，毕沅最早发现，并在《经说》四篇之后附《新考定经上篇》，并注云：“本篇云，读此书旁行，今依录为两截，旁读成文也。”然而毕注于经说校勘十不一二。孙诒让在毕沅的基础上，吸收了张惠言的校勘成就，又校定了经下篇的旁行句读，至于正文中的校诂订讹则更多。经过张惠言、毕沅、孙诒让的相继努力，《墨经》旁行句读问题，已大略可定。

自毕沅以后，校《墨子》者著称的有苏时学、王念孙、俞樾等。苏时学著有《墨子刊误》，陈澧于此书跋文中对其评价甚高：“今苏君爰山以所著《墨子刊误》见示，正讹字，改错简，涣然冰释，怡然理顺，而《备城门》以下尤详。”王念孙有《墨子杂志》，成于道光十一年，王氏《墨子杂志》自序谓：其校“复合各本及《群书治要》诸书所引，详为校正”，“旧校所未及及所校尚有未当者，复加考正。”王氏精于小学，故其于《墨子》校勘中发现古字假借字甚多，为《墨子》校勘辟一新路。俞樾师承王念孙，故其所校同王氏相类，但其《墨子平议》成于同治九年，后于王氏数十年，故于王氏所未备者多所补苴。从毕注

至《墨子间诂》，其间大约经过了一百年。在此期间，《墨子》理董日臻完备，然除毕注外，注书不传，其余也均未列入《墨子》原文，或只言片语，未尽其奥，或断珪零璧，未成家数，且各家互有短长。因此，对《墨子》重新整理，将各家校勘成果汇于一编，不仅有此必要，而且有此可能。于是孙诒让承旧校未尽之业，“理董覃思十年，略通其义，凡所发正，咸具于注”，于毕沅、苏时学诸家之校“择善而从”，收采异本“用相勘核，别为写定”，又于王念孙、洪颐煊、俞樾、戴望诸家所校“参综考读”。聚珍本通行后，又不遗余力地搜采未见之书，将张惠言、杨葆彝、黄仲弢所校正者，“并删简补录入册”^{②4}。清代旧校虽不能说百无一漏，然亦大略已备。复辑《墨子篇目考》、《墨子佚文》、《墨子旧叙》合为附录一卷。复撰《墨子传略》、《墨子年表》、《墨子传授考》、《墨子绪闻》、《墨子通论》、《墨家诸子钩沉》各一篇，合为《墨子后语》二卷。因此，《墨子间诂》称得上是清代《墨子》校勘的总结。如果说毕注是清代《墨子》校勘的第一座里程碑，那么《墨子间诂》就是清代《墨子》校勘的第二座里程碑，而其成就则远远超过了毕沅。

（二） 二十世纪墨学兴盛的基础

自《墨子间诂》问世之后，《墨子》校勘及墨学研究方兴未艾，比之清代更为兴旺。究其原因，固然与政治历史不无关系，但是同《墨子间诂》所奠定的基础是分不开的。校勘为学术研究之先务。《墨子》先前作为一部分不可卒读的古书，如果没有毕沅和孙诒让的努力，则内容均无可知晓，学术研究更何从谈起。对于《墨子间诂》，诸家有如下的评价：

“瑞安孙诒让仲容，乃集诸说之大成，著《墨子间诂》，凡诸家之说，是者从之，非者正之，阙略者补之，至经说及备城门以下诸篇尤不易读，整纷剔蠹，脉摘无遗，旁行之文，尽还旧观，讹夺之处，咸秩无紊，盖自有《墨子》以来未有此书也。”^{②5}

“盖自此书出，然后《墨子》人人可读，现代墨学复活，全由此书导之。”^{②6} 迨读孙仲容《墨子间诂》，见其于奥晦讹夺之文，详为校释，昭若发蒙，最为快适”^{②7}。

孙诒让堪称《墨子》功臣。正是在《墨子间诂》的基础上，形成了二十世纪《墨学》研究的高潮。据《七十六年史学书目》的不完全统计，《墨子》研究的专著已达三十七种之多，而单篇论文及学者专著中篇章所及也不在少数。其中有就《墨辨》加以注释考证者，如张子高的《墨经注》、张子晋的《新考正墨经注》和《墨子大取篇释》、张之锐的《墨子大取篇释文》、张其铤的《墨经通解》和《小取篇校注》，时称“墨学四张”。胡适的《墨子小取篇新诂》、胡国珏的《墨子小取篇解》，时称“小取二胡”^{②8}。还有梁启超的《墨经校释》。而今人谭戒甫的《墨辨发微》^{②8}、高亨的《墨经校注》则代表了目前《墨辨》研究的最高水平。有就《墨子间诂》加以校勘者，如李笠的《定本墨子间诂校补》、王景羲的《墨商》、张纯一的《墨子间诂笺》。有就《墨子》进行白话翻译的，如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李叔渔的《墨子今注今译》^{②9}。有就墨翟生平及学说加以研究和评论的，如梁启超的《墨子学案》，方授楚的《墨学源流》、王冬珍的《墨子新探》。有就《墨子》的哲学及逻辑学加以研究的，如胡适的《墨子哲学》、沈有鼎的《墨经的逻辑学》。还有就《墨子》中的数学、物理学以及目录版本加以研究的，等等。台湾学生书局新近所出严灵峰编的《墨子知见书目》为研治《墨子》的工具书。可谓名家荟萃，著作如林。而令人遗憾的是，到目前为止，在众多的研究著作中，尚无一种足以取代《墨子间诂》的新的完整的整理本，这是古籍整理工作面临的任务。

注释：

(1) (26) 梁启超谓：“仲容一生著述，亦以此为第一。”（《中国

近三百年学术史·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（二）》）

（2）（25）俞樾：《墨子间诂序》。

（3）（15）（16）（22）孙诒让：《墨子间诂跋》。

（4）黄丕烈：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卷四“校明蓝印铜活字本”条。

（5）吴毓江：《墨子校注》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。

（6）参见叶德辉《郎园读书志》卷五，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子部杂家类，李笠《定本墨子间诂校补》。

（7）黄丕烈：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卷四“校明蓝印铜活字本”条，引文中重点号为笔者所加。

（8）参见叶德辉《郎园读书志》卷五。

（9）参见吴毓江《墨子校注》，张重威《江藩本墨子跋》（载《艺文志》第二辑，山西人民出版社，1983年10月。）

（10）、（11）毕沅：《墨子序》。

（12）参见李笠《定本墨子间诂校补》。

（13）参见吴毓江《墨子校注》。

（14）顾千里：《思适斋集》卷九《重刻晏子春秋后序》。

（17）梁启超：《墨经校释序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22年版。

（18）、（19）孙诒让：《墨子间诂序》。

（20）（23）梁启超：《墨经校序》。

（21）邓实：《墨子经说解跋》。

（24）此段文字引文均见孙诒让《墨子间诂》序、跋。

（27）方授楚：《墨学源流序》，中华书局，1940年10月再版。

（28）参见谭戒甫：《墨辨发微序》，中华书局1964年6月。

（29）李叔渔：《墨子今注今译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3月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